毛泽东与《三国演义》

□ 陈　思

著名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不仅在华语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也产生了世界性的深远影响。毛泽东研读《三国演义》中所载的政治、军事斗争及谋略故事，并对其进行科学地参考与运用。他不但研究其中的战争和战法，还研究其组织、矛盾和特点。毛泽东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借古喻今，说明一定的道理，其中也往往渗透着辩证法分析方法。

“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指导实际工作中经常引用《三国演义》里的话。1932年，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后，有人经常借此批判毛泽东。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

尽管这个时期毛泽东受到了“照书本打仗”的批判，但他后来的军事著作却一点也不避讳引入三国的战例，并且很欣赏其中诸多布置兵力的方法。1936年，毛泽东在文章中曾明确提到“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次提到这两场战争。

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从《三国演义》中的战例获得一些启发，开拓思路，并结合战争的实际情况去灵活判断，继而作出合情合理的决策，这才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国》中的“年轻干部”

毛泽东很喜欢《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这段故事，特别注意其中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他在1953年5月谈话时说：“三国时代，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1957年，毛泽东再次举三国故事为例：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刘备不能区分主次矛盾”

毛泽东曾多次谈论刘备这个人物，有褒有贬。他对刘备的赞赏，主要集中在他善于用人，善于团结各方人士，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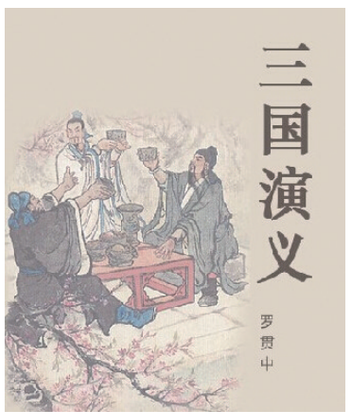
但毛泽东认为，刘备的缺点也很明显，最显著的是他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在三国成鼎立之势后，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当孙权数次征讨荆州时，刘备派了根本不执行“以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在荆州失守，关羽被杀以后，刘备急于为关羽复仇，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因此导致了失败。

“关羽不懂统一战线”

1927年，毛泽东率部进军井冈山时，张子清的第三营走散，有人认为张可能投敌叛变了。毛泽东说，三国时候的关云长，也在兵败后与刘备失去联系。曹操为了收买利用他，费了多少心机！可是，关云长一得到刘备的消息，立即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成为千古美谈。

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的这番话就得到了验证。在一场战斗的危急之际，张子清突然赶到，投入战斗，击溃了敌人，回归组织。

毛泽东拿张子清与关云长相比，体现了毛泽东对战友的信任，也说明在毛泽东心目中，关羽的忠义与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忠诚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关羽的弱点也看得很透彻。1932年初，毛泽东在与程子华谈话时说：关羽出身下层社会，是刘备的心腹之臣，随其周旋，不避艰险，死后被尊为武圣人。到处都修建有关帝庙。但他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关羽。他说：关羽这个人虽然过五关斩六将，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

1949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毛泽东曾经讲过：清朝所以能统治中国260余年，就是因为统治者一开始就制定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以少数团结了多数。《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

学习诸葛亮

在英雄辈出的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也是毛泽东非常推崇的一位。毛泽东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毛泽东十分重视诸葛亮的宣传能力。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我们的战士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是，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55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

为曹操“平反”

毛泽东向来主张对曹操给予客观的评价。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毛泽东对曹操“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及“不杀降”的政策均十分认可。

1952年11月，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儿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对曹操的磅礴气概，文韬武略，胸怀品格，均非常欣赏。在政治方面，曹操是强硬派；在军事上，曹操雄踞北方，挥师南下；在文学方面，曹操是浪漫主义豪放派。

以曹操为中心的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著名的黄金时代。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蒿里行》都是文学史上的皇皇巨作。毛泽东欣赏曹操大气磅礴、气韵沉雄的诗词作品，称赞他“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然而，曹操毕竟是封建王朝中割据一方的军阀，因时代的不同而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对曹操也有过一些批评。

1966年，毛泽东曾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毛泽东以此为例批评曹操刚愎自用，不能采纳良策。此外，毛泽东还曾批评曹操不能严于律己。《三国志》中的《武帝纪》中，讲述曹操“其今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圈画了这一段，并写道“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赤壁之战，是曹操亲自领军，亲自决策的一个重大失误。曹操却又未能自罪，可见他宽己严人，处事不公。

毛泽东与古典名著

遵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

□ 张凯宁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政策将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早在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与他的助手、芝加哥大学博士王宁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中国改革的“样本式”意义，并合著了《变革中国》一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但大体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没有改变过，并且从大的方向上一直遵从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从该书考察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行为在顺应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时，经济和社会发展就颇为顺利；反之，则会遭遇波折。这也是我阅读本书的最大感受。

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这是农村改革的逻辑。在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从表面上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与生产效率。但如果深入挖掘就会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则是其符合了市场经济规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通过自由流动寻找到了“有利可图”的部门或行业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本书认为，“从长远角度来讲，农民重新获得的经济自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要大得多”。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强调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与积极性，才能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在广大农村，农民受到的束缚较少，整个状态相较城市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中个体的一般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同土地的僵硬结合被更加自由和合理的配置所取代，产生了“化学反应”。一方面，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另一方面，对土地的使用更加多元。除了农村原本的种植业外，渔业、林业等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农村经济一扫过去的衰败景象，展现出了生机与活力。

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农村工业化革命的逻辑。在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带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民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6%上升到1996年的26%，截至2017年底，已超过60%，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中国经济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书中有言：“乡镇企业产生的积极影响远不止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它们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强效催化剂。”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感受到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鲶鱼效应”。改革之初，民营企业并没有得到政策上的倾斜，但它们通过制定与绩效挂钩的酬薪制度，灵敏地捕捉市场上的变化等行为依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而反过来又助推了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步伐。

把定价权交给市场主体，这是价格改革的逻辑。1992年，是中国价格改革“爬坡过坎”的关键一年，中央作出了一系列解除价格管制的决定，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进行自行调节，并且基本实现了自由定价的全覆盖，“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企业，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可以以相同的价格购买所有的生产资料。”解除价格管制后，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更加准确和灵敏，企业生产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组合配置。价格机制改革的筹备时间较长，晚于农村的“边缘革命”。但也正是价格革命，通过调整价格机制、修改税制等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实质性地建立起来。

时至今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依然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对于市场秩序的不断规范，对于市场规则的不断补充，都是为了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这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

把市场行为交给市场主体，并不是政府可以高枕无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充分的就业，物价的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这些都是只靠市场自身无法完成的。而政府的顶层设计，例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供给侧改革等等，才能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增添持久的动力。正如开篇所论述的，政府不管以何种手段调控市场，都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而不是伤害市场主体。对于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量，决不能发生“颠覆性错误”，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也是中国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

作者在书中谈到，“我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我想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体制自身的巨大优势和同市场的高度契合。经过几十年的变革，我们同样对于自己所经历的变革有着深切的体会与无比的自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如此，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同样能在回顾中找到答案！

读而思

竺可桢：“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治学之道

□ 王恩宝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嘉兴人，中国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纵观竺可桢精彩的科学人生，崇高的科学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令人由衷地敬佩。

笃行求是、崇尚科学。1936年秋，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两个经典之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指出：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变成简单；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他告诫学生：“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要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显然，竺可桢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栋梁之才。这种人才固然要有广博的知识，但必须具备“求是”的品质。他们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作题为“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讲演，他非常赞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认为王阳明的“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求其是而已”这一段话是对“求是”二字的很好诠释。11月19日，浙江大学根据竺可桢提议，立“求是”为校训。

1939年2月4日，竺可桢对浙江大学一年级新生作“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他说：浙江大学前身最早是求是书院，现在确定“求是”为校训。“什么是‘求是’，求是是指‘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竺可桢还以布鲁诺、伽利略、牛顿、达尔文、赫胥黎等人为追求科学真理受贫寒、遭监禁甚至英勇献身等事例，突出强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科学精神，将求是精神的内涵大大拓展。

竺可桢不仅精辟阐述和深化了“求是”精神的要义，更以其一生执着追求“求是”，当之无愧地成为践行和弘扬“求是”精神的楷模。

竺可桢在笃行“求是”的工作实践中，深刻论述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他特别指出：“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竺可桢认为，研究科学就是要在不断追求真的同时，不懈追求美和善，达到真、善、美的完美统一。为此，竺可桢制定了“理想”科学家的标准：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承认无知、勇于自省。严谨治学是成就学业的前提和根基；承认无知、自我批评、虚心好学是难得的治学品德。这些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却很难。一个科学家要承认自己无知、敢于做自我批评更是难上加难。竺可桢却经常检讨自己，确有“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

1955年11月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自省：“10点至历史所与叶企孙、侯外庐谈开第三次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以定明年度计划……叶企孙告余说岁差不但是赤经、赤纬改变，黄经、黄纬也变。可知余之无知也。”1962年9月6日，竺可桢参加科学规划会议，因9点前参加另一个会议，到了规划会上刚拿到第二稿材料，未及细看就发言，闹了笑话，因为第二稿里已将支援农业部分扩充了很多。他在日记中写道：“9点参加民族饭店综合组讨论会，讨论提纲二稿。我到民族饭店时才接到二稿，所以没有时间能仔细看，讨论时就提意见关于农业支援提的不够，但实际最后部分已大加扩充，我这如此粗枝大叶应该加以检讨。入党时马玉书同志给我一纸，说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实行民主集中，八项注意有一项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既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也随便乱发言，可耻之至。”这是极其严厉的自我批评。

人必先承认自己无知、敢于自我批评、勇做自警反思，而后才能奋力学习、不断进步、获得真知、成就事业。正是有虚心好学的严谨治学态度，竺可桢才能学富五车，为中国现代科学的进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又因为他时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以品德才能达到很高境界，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慎思明辨、终身学习。竺可桢指出：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博学不审问，无从辨别是非，故谈不上求是，但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还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具慧眼，才能真正明辨是非得失，才能谈得上求是。他说，是非得失清楚之后，就应尽自己力量实行，像诸葛武侯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那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指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递进阶段：“博学”是第一阶段，为学首先要广泛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为学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慎思”是第三阶段，“审问”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己所用。“明辨”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不辩，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要努力践履所学，做到“知行合一”。

竺可桢一生酷爱读书，治学不辍，求知不倦。1950年代初，他为了学到苏联的尖端科学技术，虽年过花甲还决心攻克俄文。年岁不饶人、记忆力差、工作繁重、困难重重，他全不在乎，除了听俄语广播讲座，还另请一位俄籍妇女担任自己家庭俄文教师，坚持数年。有志者事竟成，他终能利用俄文流畅阅读科技文献资料。

1965年，竺可桢75岁时，抄录陆游诗自勉，正是他好学不倦的写照：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974年1月26日，竺可桢在临终前10天，还叮嘱儿子竺安去新华书店购买鲁迅晚年的杂文集，以便阅读。竺可桢认为，鲁迅的文章富有战斗性，值得反复学习。而他自己也成为一生向学、终身学习的典范。